



蔡崇达的闽南情结 ——读《命运》

赵佩蓉/文

故乡，是每个作家的精神家园，源源不断地赐予作家创作的源泉和力量。泉州晋江，是蔡崇达的故乡。闽南的草木、山川、风俗滋养了他，为他的成长提供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内涵。他深情地描写故乡的自然风物，深情地凝视故乡的亲人。长篇小说《命运》以九十九岁阿太一生的故事为主线，串联起沿海小镇几代人的生活变迁。在《命运》中，可以读出蔡崇达深厚的闽南情结。

闽南偏居中国广袤大地的东南一隅，是海域开阔的地理单元。蔡崇达很早就离开泉州，但是他的审美视线仍停留在自己熟悉的地方，他把富有地域特征的地方风物的描绘放在醒目的位置，徐徐打开阿太的生活画卷。“在入海口，有条隐约的线。线这边，水是一条一条缕游过来的，融合成共同的颜色和共同的呼吸——那便是海了。”“土地被海水淹没太久了，红红的，咸咸的，除了地瓜和花生，其他作物都不让活。”这是故事发生的外围环境，为刻划靠海而生的几代人的生死起落埋下伏笔。他们的悲欢离合，好像海面在闪烁。“海边的房子总需要有个院子，院子里可以晒制鱼干或者紫菜。”简洁的语句勾勒出典型的闽南渔村风貌，向读者展示自然的乡土世界。海边的院子，是阿太（闽南人称曾祖母为阿太）的居处，也是各种故事发生的场所，为作家提供人文思考的土壤。

蔡崇达研究了先辈们走过的路，发现乡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连接着波诡云谲的时代。“咱们这儿，相亲一般一上来就问：你是讨大海的还是过小海的”，可见恶劣的自然环境下，谋生不易。《命运》中的阿太，经历了时代浪潮的撞击，她的人生分明是一部苦难史。这个叫蔡屋楼的女子，遭遇的第一个变故是阿爸撇下她们母女三人“跑了”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母女相依为命，生活孤苦。后来，蔡屋楼嫁人，打击接连不断：为了怀孕，四处求医问药。因为不能生育，“逼”走了丈夫。乱世中，陆续收养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。再后来，丈夫被抓丁逃往台湾、马来西亚。这个裹着小脚的女人，面对一系列变故，咽下了所有苦难。在与命运搏斗的过程中，阿太练就了强悍的生命意志。吃再多苦受再大罪，她都能坦然处之。“这世间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”。“好的死亡就像熟透了自然从树上落下来的果子。死的时候，世间和自己都没有伤口。”阿太的生活经验可以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。豁达的生死观，正是闽南百姓朴素的生命哲学和生存智慧。外界力量的介入，对渔村生活产生多重影响。靠海却下不得海，指望传宗接代偏只得两女，入赘女婿不辞而别，这种外部力量打击力度最大的当然数解放前后的社会运动。蔡崇达将阿太一家的命运沉浮置身在时代变化中。以阿太命运反映时代变化，体现出作家的人文关怀。

乡俗能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方式，更是维系一个区域稳定的精神力量。《命运》把闽南地区的乡土文化和风俗习惯活泼地展现在读者面前：厅堂正中供奉着神明们，西房摆的是祖宗的牌位。“在闽南，最正确的离世有且只有一种：一旦老人确定要离开人间了，就得当即要求子孙们，把自己的床搬到厅堂正中间——在家里魂灵才不会走散。在神明的注视下，魂灵才能升天。”风浪凶险，讨海人时时面临海洋暴怒对生命造成的威胁。他们需要借助超越自然法力的神灵力量。乡土的“神灵”存在久远，切近先民的生存空间。惧于自然力的强大蛮横，渔民势必对神秘力量产生敬畏和崇拜心理。泉州边上的小渔镇，是阿太一辈子的舞台。如何烧香上供，如何掷出筈杯，这种只能在闽南地区庙宇里见到的乡情场景，为小说制造出无数细节，使阿太成为一个鲜活的人，更使小说成为浓厚地方色彩的民俗文本。

除了关帝庙、三公爷庙，闽南的妈祖信仰非常广泛。妈祖娘娘的庙里，总是鸡飞狗跳的。乡邻们处理渔获物的时候，打牌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都聚到妈祖庙里。甚至有人在那儿问卜的时候，总要被打断——有人嬉笑地突然冲到妈祖娘娘面前叫嚷着，要求评理，比判一下谁的腰细屁股大。在闽南，妈祖已经不是单纯的海神，是善良、智慧、正义的化身，成为大家的“阿母”，是乡民可以随时对话，商量世间嘈杂俗事的神。这已经不是对神灵的简单崇拜，而是为社会生存建立起合理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。

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，人类的出路在于重返故里。蔡崇达的《命运》里，既有现实的故乡作为依托，小说中的情节在故乡的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像，加强了小说与现实生活的联系，加大了作品的艺术容量，又有审美的再创造，增强了小说反映生活的深度。闽南，无疑是蔡崇达的心灵之所依，心灵之所归。

甘武进/文

戴望舒先以“雨巷诗人”声名远扬。那么戴望舒的小说又怎样呢？“在后来整理的《戴望舒全集》中，有60万字的小说卷，可是由他创作的小说仅有三篇，更多是翻译小说。”戴望舒只有这三篇小说吗？在《识小录》中，作者说，有研究者相继发掘了戴望舒署名梦鸥生、笔名尧若的发表在报刊上的多篇短篇小说，其中1922年在《半月》发表的文言文小说《美人名马》，更是一篇奇侠与恋情巧妙结合的作品，不应被忽略且今后的研究应予注意。

陈子善，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。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勤勤而深耕，本书可视为其长年研究的一个缩影。所论多建基于第一手资料之上，不乏稀见版本、手稿、书信，既谈及鲁迅、张爱玲、巴金等大家名作，也发掘了一些相对鲜为人知的作家作品，以拾文学史之遗。书中，以“小”见“大”，析述文辞，校释版本，品鉴装帧，漫说文人文事。如此挖掘考辨，摘抉隐微，显发文学史的多重面向，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拓出更深层的阐释空间。

鲁迅与巴金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高峰。书中谈到“鲁迅与巴金见过几次面”。根据鲁迅先生的日记，明确提及与巴金的会面只有一次。然而根据作者的考

证，两人会面绝不只有一回，确切可靠的就有五次。书中考证，那五次会面均非普通的通应酬，而都有实质性内容，甚至“影响到现代文学史的书写”。作者上述结论并非夸张，因为鲁迅最后一部小说集《故事新编》的诞生正是由于巴金的约稿。可见，研究两人的会面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具有不凡的意义。

张爱玲早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，甚至还衍生出了庞大的“张迷”群体。然而谁最早提出对张爱玲其人其文重加研讨？现有数据显示，大陆最早公开论及张爱玲的文章是张慕莘于1981年11月发表于上海《文汇月刊》的《张爱玲传奇》。作者追问：还有没有更早的呢？他借助新出现的已故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致作家姚雪垠的通信，发现在张慕莘之前，姚雪垠曾在通信中提及“当时上海的女作家应该提到张爱玲”。时间则是1980年4月30日。

挖掘那些被掩埋的名字无疑也是作者的一项乐趣。书中介绍，敬隐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有着特别的地位。1925年，他赴法留学。在法期间，与罗曼·罗兰交往密切，做了四件“至今仍值得我们大大称道的事”：其一，将《阿Q正传》译成法文；其二，翻译《约翰·克里斯多夫》（尚未完成）；其三，撰写法文论文《中国的文艺复兴》；其四，法译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》。这是目前所知的中国新文学作品的第一个选译本，后来又据此转译了英译本和葡萄牙文译本。

闻一多的《现代诗钞》收录了陈雨门的诗歌《晚秋》。作者说：“闻一多确实慧眼独具。陈雨门的这首小诗不但是其代表作，置之当时最好的‘现代’诗之列恐也不会逊色。”已有研究者做过统计，国内近年来出版的数十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，毕昇午这个名字出现率为零。“但是，当年其诗集《掘金记》被巴金选中，列入他主编的‘文学丛刊’第二集。”此集共十六种作品，诗集只有毕昇午这本。其他十五位作者是萧军、沙汀、何其芳和巴金自己等。

闻一多将《掘金记》也列入“待访”诗集，他以读不到毕昇午的诗为恨。书中文章每篇千字左右，看似散漫，其实有一条贯穿的主线，即都是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，写现代文人文事的方方面面，做到了见多识广且深入浅出，既有学术内容，又不枯燥，既激发作为普通文学爱好者们的读者兴趣，又为有志于学术的朋友给予一些启发。陈子善说：我试图“识”大作家之“小”，识小作家之不“小”，从而揭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多样性、丰富性和复杂性，并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线索，所谓以“小”见“大”是也。

烟雨江南，岁月鎏金 ——读《流光记：杭州往事》

彭忠富/文

“江南忆，最忆是杭州；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！”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寓居，写下深情的《江南忆》来怀念在杭州的三年流金岁月。想象千年前的洛阳院内，白家班红袖歌舞，清音曼妙，已到人生暮年的白居易在舞榭歌台间，把对江南杭州的相思，又有多少寄托在了白家班花魁的红衫翠袖上。让白居易念兹在兹的肯定不只是灵隐寺、郡亭和钱塘江大潮，还有西湖、醉白楼、白堤和白乐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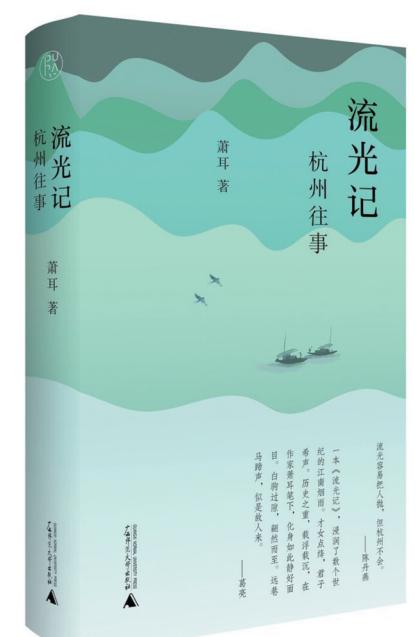
以白乐桥为例，现居杭州的资深媒体人萧耳指出：如果想拾得一段慢时光，你可以从任何一个城市、任何一个地方出发，到杭州白乐桥来。你可以每天在此无所事事，无非是漫步、静阅、品茶、望山、戏水、问佛、养心。黄昏时，乘兴到路边的小饭店喝一杯小酒，叫几碟小菜，和当地的村民拉拉家常，就像当年白居易在杭州时那样。流光容易把人抛，但杭州不会。萧耳指出，杭州有美人，有处士，有大师，有帝王，有太守，有侠客，有烈士，有法师和道人，有妖有鬼有仙，有万贯的豪奢，一庐的清寒，都在这座城池的年轮里。

萧耳认为，刀光剑影从来不是杭州真正的主题。这片土地没有背负过如扬州十日、南京大屠杀般血腥沉重的历史，所以民生大过江山，世俗之气氤氲，更关注的是一代又一代的民生幸福，也更能接纳不算伟岸的小

安小康：农耕，经商，读书，求仕以及生而为人的各种欲望。这历来是一片尊重个体感受的土地，如埋香骨于青芝坞的南宋女诗人朱淑真，在西湖边西泠桥侧的钱塘名妓苏小小等。历朝历代在杭州留下生命印痕的名人不胜枚举，譬如林逋、柳如是、苏曼殊、章太炎、林徽因等，他们吸引着五湖四海的仰慕者来此朝圣或探寻。

萧耳最新出版的《流光记》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2月）是一部关于杭州历史文化的随笔集。作者以一个漫游者的姿态，游走在杭州各处，步量江南，引出如烟的往事前尘，为千年历史古城杭州描绘出一幅独具精神气质的人文画像。本书包括“蕙的风”“朝的阳”“碧的影”“漫黄昏”“夜航船”六辑，从西湖起，至城外，又回到西湖，一步一景一故事，分述历史记忆中杭州的清气与孤高、大气与风范、阳刚与优雅、婉约与魅惑。作者笔触细腻，情感缠绵，观察细微，思考独到，堪称杭州历史文学读物的翘楚。

一本《流光记》，浸润了数个世纪的江南烟雨。萧耳采用文学手法表达西湖的文化散文，将“文人的历史”“文字的历史”“建筑的历史”穿插于杭州故事中，为解读杭州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种别致而难得的视角。譬如在随笔《醉白》中，作者谈到了“醉白楼”的得名过程。白居易在杭州为官时，公务之余经常到位于茅家埠的赵姓酒家买醉，为其题词“醉白楼”，还在无意中



演化出了其招牌菜“醉白元宝鸡”。醉白楼至今犹存，让各地前来追寻白公遗踪的游人们浮想联翩。由白居易在杭州留下的遗迹延伸开去，作者娓娓讲述了盛唐杭州达官贵人的文艺生活以及《霓裳羽衣舞》与白居易的关系，从而折射出大唐盛世的斑斓色彩。